

发隐抉微，自出一家：陈建华先生与中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学

Evolving a Unique Style and System from Exploring the Profound and Subtle: Professor Chen Jianhua and Leo Tolstoy Studies in China

张兴宇（Zhang Xingyu）

内容摘要：陈建华为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学界的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者，无论对托尔斯泰创作的阐释，还是基于比较文学和学术史视野对作家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他就托尔斯泰的小说提出的“对映体”、“主体参与与美学距离统一”等观点刷新了国内学界对托尔斯泰小说创作艺术和人物塑造手法的认识。在中俄文学关系和学术史领域，陈建华以其宏阔视野和辩证史观，梳理了我国学界接受托尔斯泰的历史脉络，全面考察了中国视域下的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深入展现了托尔斯泰对中国精神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全方位建构了这位伟大作家在中国的形象，是国内从这两个方面对之进行系统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之一。

关键词：陈建华；中俄文学关系；学术史；列夫·托尔斯泰学

作者简介：张兴宇，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艺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研究”【项目批号：22BWW0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产与俄苏文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号：22&ZD27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volving a Unique Style and System from Exploring the Profound and Subtle: Professor Chen Jianhua and Leo Tolstoy Studies in China

Abstract: As a Chinese scholar of the academic circle Leo Tolstoy studi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en Jianhua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both in the study of Tolstoy's creative works and in that of Tolstoy's lif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academic history. His concepts of Tolstoy's novels, such as "antipodes" and "the unity of 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aesthetic distance," have renovated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understanding of Tolstoy's novels in terms of the art of creative writ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 In the field of

Sino-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Chen Jianhua, with his broad vision and dialectical historical outlook, has sorted ou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olstoy's acceptance in our academic circles,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Tolstoy's thought and aesthetics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insightfully pointed out Tolstoy's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onstructed the image of this great writer as a whole in China. He is a scholar who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Leo Tolstoy in China from these two aspects.

Keywords: Chen Jianhua; Sino-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academic history; Leo Tolstoy studies

Author: Zhang Xingyu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xyzbfsu@163.com).

上世纪80年代,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步入快车道。陈建华先生当时就读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得此风气之先,因着徐中玉、倪蕊琴等诸位先生的远见和绸缪,以及李毓珍(余振)、王智量、干永昌等翻译家和学者的执教,逐渐培育起后来以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为鲜明特色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建华进入学界,并迅速成长为该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自1979年写出最早一篇学术论文“从娜塔沙·罗斯托娃形象看托尔斯泰的审美理想”迄今,四十余年间,陈建华笔耕不辍,著述迭出,成果在学界获得好评。这些成果一方面见证了陈建华在学术道路上所走过的不同凡响的足迹,另一方面也确立了其在国内外外国文学研究、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及中俄文学关系研究方面领军人物的地位。

检视陈建华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可以发现,在中俄文学关系这一总体研究领域和研究志趣背后,列夫·托尔斯泰及其创作实则是其情结所在,是其不须须臾远离的关注对象。谈及陈建华与托尔斯泰的“结缘”,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因素是师承,即导师倪蕊琴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倪蕊琴先生的指导下,陈建华的硕士论文以托尔斯泰的创作为选题,写出“论托尔斯泰对长篇艺术的开拓”一文,并在此后参与了倪蕊琴先生所主持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的翻译工作,以及她主编的《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1989)相关章节的撰写工作。在日后独立从事的学术工作中,陈建华为托尔斯泰的研究付出了大量心力,他不仅撰写了众多文本批评文章,而且托尔斯泰也是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并在以后写出了辞章精到的《托尔斯泰传》(1994、2007),编选了《托尔斯泰思想小品》(1999)、《文学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2009)等文集,近年又完

成了《列夫·托尔斯泰学术史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研究文集》¹以及《列夫·托尔斯泰学在中国》²等书的编著工作。陈建华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是多重的，不过在这多重成就之中，其作为托尔斯泰研究专家的身份，无疑是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方面之一。

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相对于同侪及后辈，陈建华对托尔斯泰的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研究志趣相对集中。相对其他学者在研究的具体方向上多点分散的特点，陈建华对托尔斯泰的研究则保持着不间断性和相对聚焦的个性。其二，研究视域开阔。这主要表现为在对托尔斯泰创作的文本进行研究之外，他亦从中俄文学关系及学术史视野对之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其三，研究成果形式多样。陈建华对托尔斯泰的研究，除了写出近20篇专题论文、访谈文章以及相关作品序言之外，亦在大量专著中频频论及，并写出了作家长篇传记，编选了相关专题文集。统观陈建华对托尔斯泰的研究，历时地看，总体呈现出三个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或者说在这一学术道路中表现出两次重要转向，即从早期对托尔斯泰创作的文本研究转向中俄文学关系视域中的托尔斯泰研究，近年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托尔斯泰学术史和学科史的观照上来。

一、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研究

自1900年托尔斯泰最早被介绍到国内起，中国的托尔斯泰学迄今已经走过了百余年风雨历程，在数代学者的合力开拓下，取得了不菲成就。根据吴元迈先生所提及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二次转型这一观念³，陈建华是第二次转型之后，具体而言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最早从事托尔斯泰研究的学者之一，“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文学新时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复兴和发展，是又一次人的觉醒和解放”（吴元迈 9），正是在这一时代氛围的感召下，陈建华这一代学人，在研究思想和方法上，破除了机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庸俗化的社会美学思想和陈腐的阶级斗争观念，在对作家的研究中开始真正回归作品本体，回归作品的艺术和美学本身，从而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批评文章和著作。

与当今国内一些主要从事托尔斯泰研究的学者相较，陈建华的相关论文数量并不多。这些论文大都成文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最初几年，在此之前，国

1 此两本书为陈建华所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列夫·托尔斯泰学术史研究”）的项目成果，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2 该书为陈建华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研究”（19AWW005）的结项成果。

3 吴元迈先生曾在其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百年沧桑”中表示，以改革开放为时限，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此前和此后表现为两次转型。参见 陈建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7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9-11页。

内外国文学研究在公开领域几近中断，国内外学术交流更无从谈起，导致学术信息匮乏，这无形中给新时期学人从事研究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在这种学术断层严重缺失情况下，这些论文对托尔斯泰创作的批评依然中肯、充满见地，表现出一位学者独立思考的敏锐审美洞察力和抽丝剥茧的概括、抽象能力，比如他对托尔斯泰长篇小说艺术的认识，对作家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对其戏剧创作的研究所做出的总结和归纳，都提出了让学界耳目一新的见解和观点。

具体而言，在追踪长篇小说这一体裁历史演进的基础上，陈建华提出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在结构上具有一种“对映体”特征。他在“论托尔斯泰对长篇艺术的开拓”一文中表示：

托尔斯泰对长篇结构的开拓主要在于作家在对生活整体宏观认识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纵向开放和横向拓宽的形态。在托尔斯泰长篇中，纵横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两个不同方向面的有机组合。首先是纵向的开放，即情节发展像生活本身那样在时空上没有极限。（……）其次是横向的拓宽，即不是由一个人物，而是由主题凝聚的人物对映体来构成长篇的结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是托尔斯泰长篇中更为重要的结构特色。这种对映体结构正是托尔斯泰“致力以求”并“感到骄傲”的结构独到之处：“建筑物的联接”不是靠情节和人物交往，而是靠“天衣无缝的”内在联系。（《阅读俄罗斯》219）

此处所谈及的“对映体”，是指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中总会出现彼此映衬、相互诠释的成对人物，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和列文，以及《复活》中的卡秋莎和聂赫留道夫，这些小说中的“对映体”人物服务于小说的主题呈现，同时小说以“对映体”人物为中心而非以事件为中心谋篇布局，从而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在纵向开放和横向拓宽的同时，保持了结构的完整和明晰”（陈建华，《阅读俄罗斯》220）。

后来陈建华又在论文“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谈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对映’、‘对位’结构与戏剧处理”¹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结构艺术提出“对位体”观念。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托尔斯泰学的发展有两个重要时期，即五四运动前后和建国后的前十七年，前者比较重视思想家托尔斯泰，对文学家托尔斯泰缺乏深入的研

1 参见 陈建华：“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谈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对映’、‘对位’结构与戏剧处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1986）：34-39。该文后被收录于倪蕊琴教授主编的《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9年）一书的第38-56页。

究；后者对托尔斯泰的考察奉苏联的文学研究思想和方法为主臬，在具体研究中不时受到庸俗社会学观念的干扰，因此，这些文章的观点和结论现在看来大多已经不合时宜。“论托尔斯泰对长篇艺术的开拓”是国内最早立足小说美学本身对托尔斯泰长篇小说艺术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之一，在此之前，夏仲翼教授所写的论文“托尔斯泰和长篇艺术的发展”¹以历时的角度，从外部，亦即从欧洲长篇小说演进与嬗变的角度考察了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特点及其为发展长篇小说艺术所做的贡献，陈建华的文章则借助对作家具体创作的剖析，从内部，亦即从作家长篇小说创作本身对作家笔下这一体裁结构上的本质特征给予高屋建瓴的概括，这两篇文章与后来倪蕊琴教授所写出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拓展”²一起成为80年代考察托尔斯泰小说艺术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托尔斯泰学中重要的学术文章，它们共同把国内对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审美特质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此外，陈建华亦在“主体参与与美学距离：也谈托尔斯泰长篇的形象塑造艺术”³一文对托尔斯泰笔下人物塑造的手法给予高度概括。陈建华认为托尔斯泰笔下形象是可以称之为“圆形人物”⁴的高超范例，这些人物的出现是长篇典型化艺术走向新阶段的标志，其在艺术上成功之处表现为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积极参与”与“美学距离”相得益彰地结合与统一。陈建华表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主观的印记，在不同作家那里，主体参与的程度有所不同，而托尔斯泰常常是“自己长篇艺术世界的直接参与者”（《阅读俄罗斯》229），除了那些自传性主人公之外，在他笔下其他人物形象身上也常常能看到其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的鲜明痕迹，诸如娜塔莎、彼埃尔、卡秋莎以及卡列宁等形象都负载着作家本人的情感投入和哲理思索。除此之外，陈建华认为，作家在塑造这些形象时把握着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在主客体之间保持着适当距离，因此，这些形象大都超越了作家“自我”，获得了更广阔的社会和美学的意义，正是基于前述内容，陈建华指出，“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托尔斯泰长篇中主体积极参与与保持美学距离的统一对形象塑造的意义时，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托尔斯泰人物塑造的艺术精髓”（陈建华，《阅读俄罗斯》331）。在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学术史上，批评家们往往从心理分析（心灵辩证法）、细节真实、生活真实，历史真实、自我分析、自传性、灵魂肉体性等等角度理解托尔斯泰塑造

1 参见 夏仲翼：“托尔斯泰和长篇艺术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5（1982）：57-64。

2 参见 倪蕊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拓展”，《外国文学评论》2（1987）：103-110。该文后被收录于《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的第1-16页。

3 参见 陈建华：“主体参与与美学距离：也谈托尔斯泰长篇的形象塑造艺术”，《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1986）：56-61。

4 指性格内涵丰厚的艺术典型。参见 陈建华：《阅读俄罗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人物的方法和艺术,陈建华所提出的“主体的积极参与与保持美学距离的统一”(《阅读俄罗斯》238)这一对托尔斯泰塑造人物艺术机制的高度概括和归纳无疑具有其独到之处,其辩证性和整体性观照视野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审美气度。

第三,陈建华深入考察了托尔斯泰戏剧创作的特点,深入阐发了托尔斯泰创作出“人民戏剧”的观念。相对对托尔斯泰小说创作艺术的考察,无论在俄罗斯还是中国,学界对托尔斯泰的戏剧关注不多。时至1956年,俄罗斯才出现第一部对作家的戏剧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即洛姆诺夫(К. Н. Ломунов)的《托尔斯泰剧作研究》(Драматургия Л. Н. Толстого, 1956);国内最早对托尔斯泰的戏剧进行研究的文献当为巴金先生所撰“《黑暗之势力》之考察”¹一文,自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内鲜见相关批评文章,直至80年代,国内才集中出现了几篇论文。陈建华所写的论文“作为戏剧大师的托尔斯泰”²便出现于这一时期。论文从作家写作戏剧的初衷谈起,并指出它们之所以被称为“人民戏剧”的缘由:“在经历了世界观激变以后,作家渴望通过直观形象的、平民读者易接受的戏剧形式来更好地反映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正因为这样,他的戏剧被称为‘人民戏剧’”(陈建华,《阅读俄罗斯》252)。这篇论文没有过多揭示托尔斯泰的戏剧创作艺术匠心所在,而是深入挖掘这些作品的“人民戏剧”题旨,譬如《黑暗的势力》所反映的虽然是农村的野蛮与愚昧,但导致这一现象的则是“黑暗势力猖獗的沙俄社会”,而《教育的果实》“将对贵族地主腐朽生活的辛辣讽刺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反人道性质的猛烈抨击结合在一起”(陈建华,《阅读俄罗斯》255),这些结论并不是基于前一时期甚嚣尘上的机械教条的庸俗社会学分析方法,而是基于考察作家世界观变化后平民化思想进一步成熟这一背景及对作品具体剖析而来,从而揭示了作品的人民性、民主性和揭露性、批判性特征,指出了其历史进步意义。时至今日,这一结论仍然以其批评的客观性而深具说服力。

二、中俄文学关系视野中的列夫·托尔斯泰

上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学科开始蓬勃发展,一代学人勉力开拓,推动了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多领域、多向度发展。如前文提及,陈建华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中俄文学关系,他所著《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³一书是国内该领域集大成之作,钱谷融先生对之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迄今为止我

1 该文原载于《自由月刊》第1卷第11期(1929年4月)。参见陈建华:《文学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第165-169页。

2 该文原刊载于《福建戏剧》1985年第1期,后以“‘人民戏剧’及其他”为题收录于《阅读俄罗斯》一书。

3 该书1998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后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再版。近年经过增补在2022年以《中俄文学关系十讲》为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20世纪以来中俄文学关系沿革的专门著作（……）这不但是一本开拓性的奠基之作，也是一本沾溉后人的有长远价值的书籍”（5）。在这一所擅长的领域，陈建华钩深致远，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全方位构建了中俄文学关系视野中的托尔斯泰形象，其中既有个案考察，又有综合归纳，从中俄文化及文学双向阐释的角度论证了中国之于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之于中国的接受关系，同时对托尔斯泰的创作在中国的译介进行了深度的考证和梳理。

在中俄文学关系中，托尔斯泰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存在，他是与西方的伏尔泰、歌德一样亦受到中国文化“滋养”的文学大家，与后两人相同，他对中国文化也有一个主动吸纳、积极接受的过程。可以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中唯一一位受到中国文化显性影响的作家，诚如陈建华所述，“就精神上的联系而言，列夫·托尔斯泰无疑是19世纪俄国作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32）。苏联时期知名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希夫曼曾在其所著《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表示，托尔斯泰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试图从东方思想家的学说中，“找到与他对生命本质、人的使命的思考相契合的思想”（А. И. Шифман 41）¹，因之，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与托尔斯泰相遇并非偶然，它对后者的影响是一个客观存在和主观接受的结果。国内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至1934年²，不过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学界鲜少这方面的文字，直至80年代之后，这一话题逐渐增多，90年代至今，学界涌现出以李明滨、吴泽霖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因而逐渐成为国内托尔斯泰学相对聚焦的问题。统观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除却早期由于时代因素无法客观评价托尔斯泰主义，认为它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观念而予以批判，今天看来失之偏颇之外，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化之于托尔斯泰思想上的影响有一个基本共识，即这种影响之所以生发乃在于后者从前者找到了精神上契合之处，即如颜炳罡教授指出，两人都是道德理想主义者，“东圣西圣，其揆一也”（颜炳罡 326）。陈建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亦持相类看法，不过在具体、审慎分析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和学说对托尔斯泰的影响时，陈建华也深刻意识到，前者在吸收后者学说时，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保持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对这些学说有误读也有扬弃，从而采取了按需采纳、为己所用的策略。其次，除了惺惺相惜的态度和求同存异的接受策略，陈建华也表明，托尔斯泰对中国儒道墨学说的关注亦与其精神个性息息相关，因为他始终处在紧张的精神探索和人生追求之中。第三，陈建华认为，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对托尔斯泰重要之处在于，它于其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思考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探索

1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2 是年在名为《钦县》的读物上，有一篇署名为“有名”的文章“由托尔斯泰与墨子的宗教观念说及中山先生的仁爱”。参见上海译文出版社编：《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39页。

人生真谛，为了在比较中认清宗教的本质，为了寻找“最纯洁的”基督教的教义”（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38），儒道墨学说对托尔斯泰终极追求而言，起到一个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撑作用。因此，在这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不仅仅是托尔斯泰的个人需要，即其自我的道德完善需要，其实更重要的，是他用以借鉴而建构托尔斯泰主义的需要。而托尔斯泰主义其实是托尔斯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云激荡的俄罗斯社会现实出发，为回答“俄罗斯该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而构想的一个道路，也是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走向“大同”的道路，在后面这一点上，托尔斯泰与欧洲文化巨擘孟德斯鸠、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人接受中国古典思想而对社会予以“改良”的忧国忧民的心态和实践可谓不谋而合。现如今，托尔斯泰主义已摆脱了任人苛责的窘境，被俄罗斯思想界看作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综上，可以说，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在国内有关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接受的讨论中，陈建华以其持中、客观的立场，同样提供了一个中国学者清醒的声音。

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化是一个双向遇合的关系。他一方面受到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伟大作家，他也以其创作对中国文学界起到了“反哺”作用，后者也是中俄文学关系中一个需要不断发掘的话题。不过，论及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是一个让人犯难的事情，这种探讨往往容易滑入形而上学思维一端。事实上，这类影响通常并不是单一指向，被影响的层面大多也是多重的，即如陈建华所说：“作家之间的艺术影响是复杂的，这不仅表现在影响源的各个不同或一个作家可能同时受到许多外国作家的综合影响，而且表现在即使同样对某个外国作家感兴趣的作家，其接受影响的角度和深度往往也是大相径庭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152）。在这种情况下，陈建华主要从“实证”入手，即从作家本人的现身说法入手，考察托尔斯泰创作之于中国作家的影响关系。巴金、茅盾都曾从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中获得启示，不过，巴金更倾心于屠格涅夫，所以，陈建华以较多笔触谈及茅盾对托尔斯泰的“偏爱”及“师承”，并以《子夜》为例具体说明，这部小说不仅在谋篇布局、恢宏画面上从《战争与和平》受益良多，而且在小说具体场景的处理上，茅盾也受到了托尔斯泰小说的启迪。中国的新文学一直以来以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为主，托尔斯泰是这一领域极具拓新意识的艺术大家，也是国内众多作家敬仰的对象，陈建华以茅盾为例所做出的比较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为此后学者在这类话题上深入开掘起到了某种引领作用。

鲁迅先生认为，俄国文学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¹。托尔斯泰是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来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因此，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翻译

1 参见美国学者巴特莱特在美国《当代历史》上所发表的“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1926）一文。本处引文参见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和传播是中俄文学关系中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领域,陈建华发隐抉微,做出了迄今无出其右的考证和搜求工夫,对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史第一个给予了全面考察和研究。这一工作大抵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追本溯源,对托尔斯泰创作在中国的最初译介史实做出大量索隐钩沉工作。比如,“托尔斯泰”这一译名始得时间及其与梁启超的关系;译入中国最早的托尔斯泰小说作品及时间¹,中国最早出版的托尔斯泰小说的单行本²,完整的《托尔斯泰传》在中国的最早译译³,以及译入中国最早的俄国文学作品《俄人寓言》与托尔斯泰的关系等等⁴。(二)对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大量的爬梳剔抉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有的译本距今时间已经久远,或者早期作品译名与今天习见译法差距甚远,译者笔名与实名需要求证等等,这些工作即如对中国古代文献版本流变稽考勘定,同样需要繁琐的搜求查索和严谨的辨析考证工夫。(三)对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译介史给予全面介绍的同时,对各个阶段的总体规律给予归纳总结。古语说,“观往以知来”⁵,对托尔斯泰译介史古今之变的考察,一者可以明了中俄文学及文化交流状况,二者则可以通过译介了解托尔斯泰的影响和国内学界对他的接受,从而把握彼时中国社会精神文化发展样貌和动态。陈建华在历史经纬中的追踪与总结,使读者和研究者对托尔斯泰作品在国内译介情势消长起伏的因由有了清晰的把握和了解。

三、学术史视野中的列夫·托尔斯泰

吴元迈先生曾提及,“对于学科发展,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外国文学研究之研究’,这是外国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表现之一”(9)。该语一方面是对新世纪以来的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总趋势的总结,另一面也蕴藉殷殷期许之情。确如吴先生所言,国内外国文学学科中的学术史研究在新世纪之初蔚然起色,逐渐成为该领域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和潜心钻研的课题,并且业已形成深入开掘和发展之势。由于学科发展和研究需要,陈建华其实早就介入这一领域,他所著《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中这方面内容占有较大比重。具体到托尔斯泰学术史研究,陈建华除了如上文所述对中俄文学关系中的托尔斯泰给予最全面梳理外,也是国内从学术史⁶视

1 即《伐林》。1905年,在王国维代行主编职务的《教育世界》第8、10、19期上刊出了托尔斯泰的《枕戈记》(后译为《伐林》)。此处参考了陈建华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学在中国》(即出)一书。

2 为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香港礼贤会出版的《托氏宗教小说》。

3 出版于1919年,为英国学者查尔斯·萨罗利亚(Charles Sarolea)所著。参见《列夫·托尔斯泰学在中国》(即出)一书。

4 参见陈建华:《中俄文学关系十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0页。该问题虽然仍旧悬而未决,但所做考证则是迄今接近真相最近的一步。

5 语见《列子·说符》。

6 本文从狭义角度,即从“对托尔斯泰本人及其创作研究的历史”使用“学术史”这一字眼。

野全面研究有关托尔斯泰批评文献的第一人。

不同于译介史，学术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全面、具体了解作家创作成就，更在于从历史维度总结既有成果和智慧，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路径及借镜，在规避误区和重复劳动的同时，以助推陈出新或破旧立新。另外，即如陈建华所指出，其意义更在于，“学术史研究的价值往往又会超越其本身，它可以加深人们对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进程的认识”¹。而托尔斯泰是一度与中国社会生活、精神文化联系密切的伟大作家²，从这多个角度而言，对于中国托尔斯泰学术史的研究显见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总体而言，学术史考察离不开对学术文献的历时梳理和对其“研究之研究”，即历时观照和辩证总结剖析，陈建华亦是从这个两个方面入手深入考察托尔斯泰的学术史的发展历程。

学术史的历时观照同译介史一样需要溯流追源，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把握时代特征和总体动态。纵览陈建华对中国托尔斯泰学术史的书写，在这一层面，可以留意到如下一些突出的方面：（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种特点在陈建华论述托尔斯泰学术史初始阶段情况时体现得最为鲜明，也殊为难得。清人王士禛曾表示，“为诗要穷源溯流，先辨诸家之派”³，穷源溯流其实也是历史书写应有之义，但其难度非亲历难能体会，因此与在译介史中一样，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这些文献的考证发掘和对史实的厘定澄清，一方面明确了中国托尔斯泰学术史的始源，另一方面也使人意识到中国托尔斯泰学的生发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再者，尤为重要的，是为托尔斯泰学术史的研究增加了“史”的份量和学术的厚重。（二）爬梳赅备，精准把握。前者指史料，后者指史实。学术史是过程学，是对学术文献的历时研究，因此，史料的相对全面是应然要求。陈建华在对托尔斯泰学术史梳理中，以时序为纲，举例发凡，力求把有关托尔斯泰研究的文献全部纳入考察视野。我们深入阅读陈建华所著的托尔斯泰学术史，可以扑面领略到史料的丰富充实，这些文献由于嵌错得当，并不让人觉得冗赘多余。此外，如托尔斯泰作品的译介史一样，托尔斯泰学术史在中国已经存在、发展了百余年，其中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献尘封在故纸堆中，需要花费发掘、查索和考证的工夫，以准确呈现史实，做到时间、作者、文献和来源的如实对应，比如，在《列夫·托尔斯泰学在中国》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段文字：“1919年，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由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完整的《托尔斯泰传》问世。此书系英国学者查尔斯·萨罗利亚（Charles Sarolea）所著，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全

1 该语见陈建华所著《列夫·托尔斯泰学在中国》（即出）一书序言，下文引文未注明具体出处、页码者，均出自该书，不再另行注出。

2 陈建华表示：“托尔斯泰在他的‘人生的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人道精神、批判意识和哲理内涵，得到了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者的认同，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参见陈建华：《文学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第258页。

3 语出《然灯记闻》。

书次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该书共十三章, 151页, 约7万多字, 内容包括少年时代、高加索时期、克里米亚之战、彼得堡时期、修养时代与狂放时代之末期、社会改良家和政治家之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遗著等。译者为张邦铭与郑阳和”。对于这些文字, 作为读者, 可以深切感受到它所给信息的完整、具体、详实; 但若以同理心视之, 则能深刻体会到其背后的考证功夫。这类例子在其所著相关图书中所在皆是。(三) 消长兴衰, 全面审视。与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学一样, 中国的托尔斯泰学的发展态势同样与时代、社会关系密切。兹举两例说明。通过陈建华笔下的托尔斯泰学术史, 我们可以了解到, 中国托尔斯泰学的肇始与19世纪末西方意识形态传入中国有关, 而且, 在中国一开始就与激荡社会的各种思潮相连。彼时托尔斯泰以闻名于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进入中国, 引起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充分重视, 不过其时学界看重的是他的思想, 并且由于研究力量相对匮乏原因, 研究成果并不丰硕。这种情形与百年后新世纪以来的国内托尔斯泰学形成鲜明反差。近20余年来, 中国的托尔斯泰学发展状况今非昔比, 这主要表现在, 研究成果迭出, 令人目不暇给; 关注视角、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可以说, 中国的托尔斯泰学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衰, 由之, 这种历时观照, 不难让人体会到一国的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

除了历时观照, 陈建华亦对托尔斯泰学术史中的相关文献给予辩证总结剖析。在相关著作中, 这两者是彼此交融在一起的。在这种糅合的叙述中, 不难窥见这种总结剖析的独到方法, 总结起来, 大致有这样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方面。其一, 概说与细读相结合。无论是从整个百年托尔斯泰学术史还是其中某个历史阶段上, 批评文献芜杂散乱, 这时候需要一种掇菁撷华的工夫, 因此, 除了对文献的遴选需要花大量时间查索搜求外, 对其中质量上乘文献的选择与审读就如沙里淘金更需眼光和识见。举例来说, 对于起步阶段论及托尔斯泰的文字, 陈建华除了对标志性文献, 即代表中国托尔斯泰学肇始的文献给予细述外, 对这一时期深具学术价值的文献, 比如王国维、辜鸿铭、鲁迅、李大钊的文章予以详细评析, 彰显这些文化大家对托尔斯泰评介的历史贡献。又比如, “五四”时期的托尔斯泰学相关文献增多, 陈建华对这一时期沈雁冰(茅盾)、瞿秋白、张闻天等人的贡献重点介绍, 对其他相关文献只做一笔带过, 这种简单介绍和择要评述的方法贯彻在陈建华所著有关托尔斯泰学术史的始终。在后期研究文献大量增多的情况下, 陈建华则采取对文献分类介绍的方法, 但对每一类型的文献具体考察, 仍旧遵循这一原则。这种详略分述, 一者可以凸显经过时间淘洗的文献的历史价值, 增益其华; 二者则是学术史书写本身的需要。陈众议先生说, 对研究史料“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 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 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 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6), 知其难为而勉力为之, 陈建

华所写相关托尔斯泰学术史做到了这一点。其二，微言奥旨和春秋笔法的结合。微言奥旨是对研究者思想的发掘和概括，亦即萃取要义；春秋笔法则是对批评话语的评鹭，借助扼要点评指出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充类至尽。陈建华总是以不多文字点拨出既往批评文献的题旨、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这类精到总结的文字构成了陈建华相关著作的魂魄，它们意味隽永，每每引人启悟，让人获益匪浅。其三，历史语境和历时视野的结合。学术史的研究是历时观照，需要一种历史视野，要把时代性和当下性结合起来，亦即要综合把握历史文本的优长和不足。具体到对作家学术史研究，并非既往研究文献尽数糟粕，反倒常常有不少成果历久弥新、不因时代因素而失去其价值，因此，在这种历史维度下，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便需要一种辩证立场。中国的托尔斯泰学历尽波折，它在清末民初发轫，历经“五四”、国内战争、建国后前十七年、改革开放等等历史时期，历史语境全然不同，陈建华在相关论述中，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并不回避文本的“历史”问题存在，总会指陈得失，坦陈观点。比如谈及韩长经的论文“鲁迅论列夫·托尔斯泰”，陈建华指出，文章思路清晰，但有些批判文字并无学理可言，“这种运动干扰学术的现象在当时并非个案，这是时代在中国‘托学’发展中留下的印记”。这种因为时代因素留下各种“印记”的文章还有很多，陈建华并不回避或有意忽略，总是指出文章这方面的疏失，以做镜鉴。

陈建华笔下的托尔斯泰学术史视野开阔，内容丰赡。在陈建华笔下，学术史视野中的列夫·托尔斯泰其实是近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借助历史观照和辩证剖析，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充分融入了百余年来中国精神文化乃至社会意识的重构，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的新文学、新文艺、新思潮的革新；另外，百余年来中国托尔斯泰学术史，成就斐然，不过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这一研究依然任重道远，尚需创新思维，纵深开掘。通过学术史视野，从托翁之于中国和中国之于托翁两个方面，陈建华建构出国内最全面也最丰满的托尔斯泰形象，这是对中国托尔斯泰学做出的重大贡献。

由于研究志趣和学科发展需要，陈建华在进入学界后，研究方向很快转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领域，但最初短短数年间撰写出的这些托尔斯泰研究文章却不乏创见。无论从文学关系层面还是从学术史层面，陈建华以其宏阔视野和辩证史观，梳理了学界接受托尔斯泰的历史脉络，展现了中国视域下的托尔斯泰的思想和美学，考察了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从而全方位建构了这位伟大作家在中国的形象。这种以托尔斯泰为个案对中俄文化交流的研究，对我们吸收域外文明成果，促进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将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且重要的积极影响。

Works Cited

- 陈建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7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
- [Chen Jianhua. *The Academic Cour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Vol.7.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6.]
- ：《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 [—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of 20th Centur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2.]
- ：“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谈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对映’、‘对位’结构与戏剧处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1986）：34-39。
- [— “Dostoevsky’s and Tolstoy’s Breakthrough in the Structural Pattern of the Novel.”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1986): 34-39.]
- ：《文学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
- [— *Literary Influence: Tolstoy in China*. Nanchang: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2009.]
-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1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 [—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Vol.1.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7.]
- ：《阅读俄罗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
- [— *Reading Russia*.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 ：“主体参与与美学距离：也谈托尔斯泰长篇的形象塑造艺术”，《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1986）：56-61。
- [— “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Aesthetic Distance: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art in Tolstoy’s Novels.” *Journal of Shangha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 (1986): 56-61.]
- ：《中俄文学关系十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 [— *Ten Lectures on Chinese-Russian Literary Relations*. Beijing: Peking UP, 2022.]
- 陈众议：《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 [Chen Zhongyi.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Cervantes’s Work*.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 洛姆诺夫：《托尔斯泰剧作研究》，徐宗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Lomunov, K. N. *Leo Tolstoy’s Drama Creation*, translated by Xu Zongyi. Xining: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倪蕊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拓展”，《外国文学评论》2（1987）：103-110。
- [Ni Ruiqin. “Tolstoy’s and Dostoevsky’s Expansion of Full-length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1987): 103-110.]
- ：《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o Tolsto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1988.]
- 钱谷融：“序一”，《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
- [Qian Gurong. “First Prefac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of 20th*

Century.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1998.]

Шифман А. И. *Лев Толстой и восток*. М.: Наука, 1971.

[Schifman, A. I.. *Leo Tolstoy and the East*. Moscow: Science, 1971.]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ed. *The collection of the theses on Tolstoy's Creatio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3.]

吴元迈：“序：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百年沧桑”，《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7卷，陈建华编。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

[Wu Yuanmai. “Preface: A Century of Vicissitude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Vol.7, edited by Chen Jianhua.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6.]

夏仲翼：“托尔斯泰和长篇艺术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5（1982）：57-64。

[Xia Zhongyi. “Tolsto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Full-length Novels.”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1982): 57-64.]

颜炳罡：“托尔斯泰与儒学”，《国际儒学研究》第22辑，单纯、于建福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25-336页。

[Yan Binggang. “Tolstoy and Confucianism.”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Studies* Vol. 22, edited by Shan Chun and Yu Jianfu.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13. 325-336.]